

# 目 录

从历史文献看北方汉语里包括式的来源 .....	徐 丹( 1 )
汉语虚义助动词“为”的来源及发展 .....	刘文正( 17 )
汉语{开眼}{合眼}动词的历时演变及其他 .....	陈 智( 30 )
从量词“介”谈个体量词来源的一种特殊途径 .....	乐 优( 44 )
从藏缅语的演变条例论上古汉语啞冠响音与清响音声母 .....	郑 伟( 54 )
近代官话中通臻两摄合口入声分合关系考辨 .....	宋华强( 74 )
古籍俗写的音义及词义梳理 .....	曾 良( 88 )
“合式”“合适”的成词理据及历时替换 .....	马雅琦 张文国( 100 )
“手段”考源	
——兼论“手段”义场的词义演变 .....	詹静珍( 112 )
“报应”的词义发展: 从中土到佛经的移用和演变 .....	王金英( 122 )
中古石刻典故词语释读四则 .....	王 静( 128 )
宝卷俗讹字释例 .....	周太空( 138 )
《甬言稽诂》的成就和不足 .....	周志锋( 148 )
再论《三朝北盟会编》的语言特点与内部差异 .....	许峻玮( 161 )
说“薄板车”	
——兼论辞书对相关词条的释义 .....	田启涛( 177 )
“檐笠”源流考	
——兼谈方言名物词的探源问题 .....	黄沚青( 182 )
研究生论坛	
郭店简《唐虞之道》“訇”字诸解平议及新释 .....	孙兴金( 192 )
探寻“准联绵词”理据的一种方式	
——以“婵娟”及相关词语的考源为例 .....	袁 也( 200 )
“每下愈况”是怎么变成“每况愈下”的? .....	戴佳文( 210 )
唐五代碑刻所见“百牛”词义考 .....	吴慧欣( 219 )

### 异形同源和同形异源

- 两种值得注意的唐代墓志典故词语例释…………… 张永惠(224)  
吐鲁番出土唐代书信中的肯定语气词“在”…………… 丁爱玲(233)

### 信札专题

- 郭在贻教授致洪成玉教授书札九通…………… 《汉语史学报》编辑部(244)  
新发现郭在贻先生信札四通…………… 尤 澳 杨祖荣(249)

### 编者的话

## CONTENTS

- The Source of the Inclusive Use in Northern Chinese: An Investigation Util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 Xu Dan
-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irtual Auxiliary Verb *Wei*(为) .....  
..... Liu Wenzheng
- 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hinese Verb of “Open Eyes” and “Close Eyes” and Others ..... Chen Zhi
- An Exploration of A Particular Origin of Individual Classifiers—Taking the Classifier “Jie(介)” as an Example ..... Le You
- On the Reconstructing Pre-sibilant Sonorants and Voiceless Sonorants in Old Chinese through Evolutional Rules in Tibetan-Burmese Languages ..... Zheng Wei
- A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ering Finals of Tong(通) and Zhen(臻) in Early-modern Mandarin ..... Song Huaqiang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Demotic Character in Ancient Books and the Sorting out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 Zeng Liang
- Lexical Motivation and Diachronic Substitution of “*Heshi*(合式)” and “*Heshi*(合适)” .....  
..... Ma Yaqi Zhang Wenguo
-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Shou Duan(手段)”——Also 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Field of “Shou Duan(手段)” ..... Zhan Jingzhen
- The Development of “*Baoying*”(报应): the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Buddhist Sutras ..... Wang Jinying
- Four Allusion Words Interpretation in the Middle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  
..... Wang Jing
- Interpretation of Vulgar and Erroneous Characters in Baojuan(宝卷) ..... Zhou Taikong
-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Yong Yan Ji Gu* ..... Zhou Zhifeng
- Re-discuss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Sanchaobeimenghuibian* .....  
..... Xu Junwei
- Talk about *BoBanChe* “薄板车”——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ated Terms in the Refer-

ence Book .....	Tian Qitao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Jikong</i> (𪚩筌) in Wu Dialect—Also on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Noun Words in Dialects .....	Huang Zhiqing
The Overviews an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aph <i>Jin</i> (𪚩) in the Guodian <i>Tang yu zhi dao</i> Manuscript .....	Sun Xingjin
A Method of Exploring the Motivation of the Approximate Alliterative Words—Take <i>Chanjuan</i> (婵娟) and Related Words as an Example .....	Yuan Ye
How did <i>Mei Xia Yu Kuang</i> (每下愈况) Change to <i>Mei Kuang Yu Xia</i> (每况愈下)? .....	Dai Jiawen
Research on “ <i>Bainiu</i> ”(百牛)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	Wu Huixin
Heterograph and Homograph—Two Kinds of Noteworthy Epitaph Allus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	Zhang Yonghui
Sentence-final Affirmative Particle <i>Zai</i> (在) of the Tang Dynasty Letters Unearthed in Turpan .....	Ding Ailing
Nine Letters from Prof. Guo Zaiyi to Prof. Hong Chengyu .....	JCLH Editorial Office
Four Newly Discovered Letters from Guo Zaiyi .....	You Ao Yang Zurong

# 从历史文献看北方汉语里包括式的来源<sup>\*</sup>

徐 丹

**内容提要** 汉语在 12 世纪出现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当来自北方非汉民族语言的影响。历史材料和仅有的语料都表明,来源很可能是女真语。传播的人群为燕云的汉人、胡化了的汉人、汉化了的契丹人及女真人。12 世纪《三朝北盟会编》里的语言材料表明,女真语里“自家”和“我家”的用法已形成最小对立,最初的语料只见于金朝女真人的对话中。燕云汉语最先接受了包括式的用法。

**关键词** 包括式 北方汉语 女真语 契丹语

## 一 引言

汉语里包括式(咱们)和排除式(我们)的对立一直是汉语历时语言学里的一个重要课题。前贤已发表过很多文章,如吕叔湘(1940)、张清常(1982)、刘一之(1988)、梅祖麟(1988)等等。大多数学者如吕叔湘(1949)、太田辰夫([1958]1987)、王力([1958]1980)等都认为包括式是宋朝期间出现的。至于这种对立的来源,不少学者认为是受到了北方非汉民族的影响而产生的(张清常,1982;梅祖麟,1988 等),但缺乏具体论证<sup>①</sup>。刘一之(1988)认为这个句式真正出现的历史时段不早于 12 世纪,并列出了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朝代 16 种白话资料。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些证据更早的例证。

关于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来源于非汉民族语言影响这一假设,学者们一直苦于缺乏语言上的直接证据。从历史时代看,12 世纪前后曾经在中国北方广阔的土地上演绎统治者的非汉民族,主要有辽朝、金朝。金朝甚至深入到了中原地区。西夏统治的地盘有限,没有扩展到汉人腹地。可以说 12 世纪时期对北方汉人影响较大的是辽、金两个朝代。辽朝统治者的语言是契丹语,金朝统治者的语言是女真语。契丹语、女真语的记录实为有限,这两种语言的文字被很多学者探讨过。但是由于已有的文字尚未被全部破译,故句法方面的概貌始终不大明朗<sup>②</sup>。

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即通过间接的证据——历史文献辅佐语言证据论证这一假设,说明汉语里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是受到了北方非汉人群语言的影响。换言之,是受到了阿尔泰语言的影响。关于“阿尔泰语系”的争论一直未休,本文暂不讨论这个

<sup>\*</sup> 本研究受到欧盟研究基金项目的资助 ERC-2019-AdG 883700-TRAM 以及法国—香港国际合作项目 PHC PROCORE PROJECT N° 46864RH 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sup>①</sup> 诚然古汉语里早已有“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吾与汝毕力平险”(《列子》)这类句子,但是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包括式。真正的例子都是 12 世纪以后见于宋、金时期文献的例证。

<sup>②</sup> 如在金光平、金启葆《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80:200)的著作里,由于女真语第一人称复数的材料缺失,引用的例句来自满语。

语系是否成立,仍采取“阿尔泰语言”这个术语以便讨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诸语都属于阿尔泰语言是不错的,而契丹语接近类似蒙古语族的语言,女真语接近通古斯语族的满语,这点学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纵观世界语言,没有包括式/排除式对立的语言为多数(请参见 WALS 网站提供的数据)。有这种对立的语言常常在地理分布上出现聚集的状态。根据 Bickel and Nichols (2005)基于近 300 个语言的统计,40%的语言都有这种对立。作者们的结论是,这个语言现象的地理区域特征很明显,语言内部演变的机制和语言外部的接触、影响都可促成包括式/排除式的产生。

本文重点放在了“包括式”的来源问题上,因为所谓“排除式”是人们的一种诠释,是和包括式相对而存在的。人类语言都有“我们”,但不一定需要包括式/排除式的对立。这意味着,“我们”是最基本的无标记的形式,而“咱们”这类表达是有标记的、后来衍生出来的形式。很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这点,如 LaPola (2005:291)认为,藏缅语里的包括式(inclusive)是后于排除式(exclusive)而兴起的,是一种有标记的创新形式。他发现,在 170 个藏缅语的语言和方言里(不限于中国境内),69 个语言或方言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分。哈斯巴特尔(2007:27)在研究了阿尔泰语的包括式和排除式后,指出包括式“是晚于排除式形式出现的新的结构”。藏缅、阿尔泰语言的这种类同现象向我们表明,包括式是后起的,是有标记的形式,这在语言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汉语也是如此,在古汉语里,“我”可以表达复数,即无标记的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早已存在。宋朝时期文献中的“我”仍然可以表达单数或者复数。宋代“我”后开始出现了复数标记的不同变体,如“满、门、们”。“咱们”是在北方后来兴起的新的形式,与“我们”表达的意义对立。总而言之,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句法地位不能等同对待。

由于这一对立具有普遍的地理区域特征,本文只限于讨论北方汉语里的这一对立句式。汉语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里的这种对立有着本质的不同<sup>①</sup>。本文的研究将不含汉语南方方言里的包括式和排除式,而尝试利用历史资料及十分有限的语料论证北方“包括式”在 12 世纪形成的可能性。

## 二 12 世纪时期的历史背景

本文锁定的目标在北方,那么就有必要看一看 12 世纪左右,中国北方的历史背景及各个人群的语言状况。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892—942),本为中亚人,后被后唐皇帝明宗李嗣源(867—933)赏识,曾为河东节度使。由于受到后唐末帝李从珂(885—936)的猜疑,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求助于契丹,契丹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石敬瑭建立了后晋。燕云十六州大致相当于今

<sup>①</sup> 北方的包括式和排除式形式非常统一,均用一种代词形式,而南方表达这个对立用了各种不同的形式,有语音形式、词汇形式,还有词组形式。南方方言里的包括式和排除式常常毫无关联,即可以没有共同语素,如闽语里的厦门话、潮州话、福州话(梅祖麟,1988)、台湾话、吴语里的温州话(王聪,2016),等等。南方的包括式和排除式来源各异,这与南亚语系尤其是南岛语系诸语都有干系,和北方形成的方式不同,另当别论。中国境内南北方的包括式和排除式从音到词的表达方式都相差甚远,这正是桥本万太郎([1978]1985)早就论证过的中国境内语言具有地理语言学特征。

天的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保定、河间以北、山西北部。燕云十六州后来成了辽国主要的农业区,长城以南区域比北部更具“天时地利”的条件(吴松弟,1997,卷四:21-22),所以辽朝统治者很看重这个地方。宋朝统治者也难忘失地。金朝统治者看透了这点,以此地为资本,与宋朝周旋,借机盘剥宋朝。徐梦莘12世纪初编撰的《三朝北盟会编》惟妙惟肖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燕云十六州从938年割让给契丹,到明朝1368年,一共历经了430年才全部恢复到中原汉人统治者的手中。燕云十六州归辽的直接后果是宋朝北方从此再不得安宁。北方草原民族由此崛起,并稳定发展,最后扩张到中原地区,为日后蒙古元及清王朝的建立进行了铺垫。这一阶段的历史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也改变了北方汉语的面貌。北方游牧民族和北方农耕民族——汉人开始杂居、通婚。辽太宗曾下诏:“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辽史·太宗本纪》)。再如金朝世宗鼓励猛安谋克<sup>①</sup>人户,“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金史》卷四六《食货志》);金朝统治者的政策是,“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金史》卷四四《兵志》)。辽朝、金朝统治者将大批汉人掳到东北及东北西部草原地区等地;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又把大批契丹人、女真人迁入华北(参见吴松弟,1997,卷四:9),充实中原地区,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辽朝和金朝的统治者在这方面的政策如出一辙。

在这不断易主的四百多年间,燕云汉人先是“契丹化”,后又“女真化”,总体来说是“胡化”或“去汉化”。北宋苏辙出使辽国已发出感叹,“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根据刘浦江(1998:60)的研究,“燕云汉人的胡化倾向还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上。从文献记载来看,辽朝对汉人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政策,并未强迫他们改从胡俗”。纪楠楠(2006:24、43)谈到,“当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成为辽朝属民之后,其不仅在性格方面,而且在生活习俗上也开始发生全面的‘胡化’……在宋人和辽朝的幽云汉人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认同感”。当金朝打败辽朝后,“大部分幽云汉人曾不遗余力协助金军攻宋”。这使得史书记载里,明显有嘲讽燕人这种态度的片段:“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复嫁女真耳。”(《三朝北盟会编》,卷八:9B)四百多年的共同生活改变了当地的汉人,也深刻地影响了非汉人群。燕云十六州的人群杂居、语言频繁交流的态势是双向的运动。契丹人和女真人的精英阶层都熟悉甚至精通汉语,崇拜汉文化。此处仅举一例,在《金史》中,世宗(1123—1189)一方面要求女真人向汉人文化看齐,“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世宗本纪》);另一方面又多次哀叹:“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世宗本纪》)“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乐志》)世宗还责备海陵王:“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世宗本纪》)可以说这四百多年期间,是燕云汉人和游牧民族不断融合、互相同化的时期。这方面的历史文献及文章不胜枚举,此处不赘。

<sup>①</sup> 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

### 三 辽金统治时期的语言概况

现在再看看这一地区的语言概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群体(不一定同祖同宗)的认同标志。如果说北方非汉人群——契丹人和女真人的语言对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有很大影响,那么就要看看这几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北方和汉人接触的非汉群体不限于契丹和女真,还有奚人、室韦人、回鹘人、西夏人等,但对燕云汉人影响最大的当数契丹语和女真语。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9B)里就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当契丹强盛之时,虏<sup>改作俘</sup>获异国人则迁徙于此杂处。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西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

这表明当时汉语是各个群体之间的“通用语”。如《辽史·皇子表》中有这样的记载:“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契丹和女真人之间也语言不通。有史书为证:“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金史·始祖以下诸子勳传》)这些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女真人最初是如何努力学习别族语言 and 文化的。契丹语和女真语不属于同一个语族的语言,例如 Janhunen (2008),孙伯君、聂鸿音(2008),Janhunen (2012),呼格吉乐图(2017)等认为,契丹语更靠近蒙古语族语言;金启琮、乌拉熙春(1994),哈斯巴特尔(2008),Janhunen (2008)等认为,女真语是一种和满语相近的古老语言。契丹语和女真语虽然不属于同一个语族的语言,但女真人大概普遍掌握契丹语。女真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基本都得通晓契丹语或者必须通晓契丹语。下面这段文字出自《金史》卷五三《选举志》:

国史院书写。正隆元年,定制,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书写,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汉人则试论一道。

这种考试模式,使人确信女真人应该通晓契丹语,尤其是精英阶层。从上述历史记载也可以看出,女真人努力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继而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刘浦江(1998:59)曾谈到一个胡化汉人家族的墓志,耿氏家族某人“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再如其孙,“善骑射……自孩幼习将相艺,识番汉书”。这表明当时的燕人入辽后开始尚武、推崇番汉两种语言,这些都是“聪敏”的象征。这个事实也向我们表明,燕云汉人也是努力习得“北方语”即非汉语言的。燕云地区的汉人受到了外族语言的深刻影响。

从10世纪开始,燕云汉人与宋地其他汉人各自的语言都逐渐发生了不同的演变。这一地域汉人的语言奠定了北方话的基础。爱新觉罗·瀛生(2004:675)早就提出,现代北京话“源自宋、辽、金、元的幽燕语”。沈钟伟(Shen,2015:91)通过比较契丹小字、女真文字、八思巴文字指出,辽朝时期就奠定了现代北京话的语音基础<sup>①</sup>,且这些变化比《中原音韵》记录的早三百多年。傅林(2017:40)的研究也指出,“辽代的政治崛起使幽燕地区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得以保持和扩散……在汉语北方方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辽代是奠定后世格局的关键

<sup>①</sup> 沈钟伟(Shen,2015:91):“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Beijing Mandarin can be traced to the Liao Dynasty, about three centuries earlier than the ZYYY[Zhongyuan Yinyun].”



时期”。笔者同意他们的看法。周德清 1324 年编撰的《中原音韵》，反映了中古汉语语音向早期官话演变的过程。沈钟伟指出，其中许多语音现象，如浊塞音清化、重唇变轻唇、入声消失等，在非汉语文字和汉语的对音中已经清楚地有所反映。这些音韵变化表明辽朝汉语是早期官话的源头，部分变化邵雍早已涉及（参见雅洪托夫，[1980]1986）。而这些讲早期官话的人群恰恰分布在辽朝、金朝的地域，即燕云汉人的居住地。

#### 四 关于《三朝北盟会编》

现在观察一下语料里透露的信息。刘一之（1988）列举了 16 种白话语料。12 世纪以降的后期资料里，汉语北方话里的“包括式”走向成熟并扩散开来，对此不必多加论述，我们只关注“包括式”最初在北方汉语里是如何形成的。最早的语料见于《三朝北盟会编》。该书是宋朝徐梦莘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宋、辽、金许多史实。其中宋金谈判的白话材料尤为珍贵。“包括式”的例句最初见于该语料（刘一之，1988），该语料里面例子不多，却很能说明问题。《三朝北盟会编》的语言性质曾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如梅祖麟（1980），刘坚（1982），刘坚、蒋绍愚（1992），范朝康（2000），崔译文（2013），胡敏韬（2018）等。《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宋金两朝的谈判记录，所以里面有年代、有人物，清楚地记载了 12 世纪口头谈判的材料。只是各卷的语料性质并不均匀，比如对话部分，有些对话记录的白话成分多些，有的对话仍然是文言成分多。这很可能与作者徐梦莘参考汇集了 205 个不同的文献有关。白话成分在《燕云奉使录》中多有体现，梅祖麟（1980）已经注意到，当时在其他文献还未普遍出现的句式，在该篇中已经率先出现了，如语序“V 了 O”（其他文献还都是“VO 了”），再如许多白话词“要、到、都”等而未用文言词“须、至、悉”等。仲伟民（1990），邓广铭、刘浦江（1998），黄宽重（2003），常征江（2015）等学者对《三朝北盟会编》的版本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三朝北盟会编》的版本更接近原来记录的语言，而其他一些经过修改的文献，如宋朝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梅祖麟，1980），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纂的《四库全书》（常征江，2015）里面从《三朝北盟会编》抄录的文献，修改的地方很多。据黄宽重（2003）的研究，明朝修纂的《永乐大典》收录了《北盟录》《宋北盟录》不少资料，他认为，二者皆为《三朝北盟会编》的别名。仲伟民（1990：42）认为“《会编》集某人某事有关之材料，不加删节的全部记载，宁失之繁，不失之简”，这恰恰是《三朝北盟会编》的珍贵之处。我们的例句来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版本<sup>①</sup>，此本最大的优点是清人许涵度把《四库全书》涂抹的字句“均照原钞刻作正文”<sup>②</sup>，语言学工作者都知道，未加斧凿的语料更具价值。

#### 五 “包括式”首先见于女真语的汉译口语语料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含有“包括式”的几个例句。这些例句大部分都出现在《燕云奉使录》

<sup>①</sup> 本文也参见了蒋绍愚校录的版本，见于刘坚、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sup>②</sup> 请参见《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版）邓广铭序。

中,这个历史事件的记录者、整理者是燕人赵良嗣(原名马植)。他极力主张宋朝联金击辽,并多次作为宋使去金国谈判。后来由于宋亡于金,有些史书归罪于他。功过是非,此处不论。但他的背景值得了解。《三朝北盟会编》里有这样的记载:“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卷一:3b)前面几节我们已经谈过,燕人先和契丹、后和女真都深度接触后“胡化”,这个过程约有四百多年,赵良嗣也不应例外。况且作为辽国大族,他当属上层阶级。精英阶层对契丹语都有所了解甚至熟练,赵良嗣多次去金国谈判时,金国还未处于绝对优势,金灭宋以后,燕云汉人才开始女真化,故赵良嗣不懂女真语在情理之中。赵良嗣出使金国在《三朝北盟会编》里明确记载为“宣和二年三月六日”,即1120年赵良嗣出使金国。后来赵良嗣又多次出使金国,在他负责编撰的《燕云奉使录》里,几次写到他和金人的对话需要译者,如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三日那次谈判:

是日良至军前……见虏酋,令译者传言

同样,金人也不甚通晓汉语,或谈判不敢忽略,也需要翻译:

阿骨打及其下诸酋长大喜,继令译者问……

这样我们可以确知,赵良嗣不懂女真语,他记录的对话内容均是根据译者的译文。最初能见到记录的“包括式”都出现在对话里,且绝大部分都出自金人之口。“包括式”最初的形式是“自家”。吕叔湘(1940)早已指出:“宋人自家一语,有(a)自己,(b)我,(c)你我三义。自家和音为咱。宋人用咱之例甚少。”在1984年(吕叔湘著,江蓝生补)的文章里,吕先生上述基本观点未变,即“咱”是“自家”的合音,进而又加进了几个《三朝北盟会编》的例子。太田辰夫([1958]1987)跟随吕先生的观点,也认为在宋代产生了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自家”演变为“咱”“咱门”。关于“自家”有“自己”等用法,本文不予讨论,只看“自家”表达包括式的例子。上面已经说过,最早的例子都见于《三朝北盟会编》,而且多数例子都集中在《燕云奉使录》,即赵良嗣执笔的章节中。请看《三朝北盟会编》里的例句:

(1)阿骨打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闲事,怎生和得? ……”(卷四:4B)

(2)[粘罕<sup>①</sup>]且言:“此是契丹男妇媳<sup>②</sup>,且教与自家劝酒,要见自家两国欢好。”(卷四:7A)

(3)二十二日见元帅粘罕,且言:“今来所计议事节,与自家上京时说底话煞别也。”(卷一一:4B)

(4)粘罕且笑且言:“……莫且自家门如今且把这事放着一边,厮杀则个。”(卷一四:6B)

在马扩(和其父马政、赵良嗣一起出使过金国)记录的《茅斋自叙》里,有一例燕人的例子:

(5)a. 事已如此,自家满<sup>③</sup>这里斗口做甚。(引自刘一之,1988:107)

b. [王介儒]“事已如此,自家这里斗口做甚。”(卷二三:4B)

上面五例中,例(2)包含了两次包括式“自家”,也可以说总数是六例。除了第五例是马扩记载的,其余的全是赵良嗣的记录。例(5)中,说话者是代表金国的王介儒。根据《三朝北

① 《金史·完颜宗翰传》记载“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国相撒改之长子也”。

② 刘坚、蒋绍愚(1992)校释:“袁本作‘儿媳’。”

③ 刘一之例句里的用字是“懣”。

盟会编》的记载,王介儒最初是为辽朝,即契丹人效力的,作为燕人,他对宋朝颇有怨恨之情,这似乎代表了部分燕人的心态(纪楠楠,2006)①。从《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来看,为金国效力并作为金国使者的燕人不在少数②。《金史·外国传·西夏》对王介儒的记载是“左谏议大夫王介儒”。赵良嗣记载的文(例1至例4),都出自金人之口。这里的“自家”不是指金国“自己”,而是指宋金两国。吕先生认为金人白话中,“自家”多用如“咱”,即包括式。上述例子已被刘一之(1988)的文章列举过了。本文例子中如果说说话人身份已明,则不加注;若不明,则例子前面用方括号注明谁是说话者。这些例子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金人汉译白话。虽然这些句子都被“译者”翻译成了汉语,但能看得出来,“自家”能更好地反映金人的语言,汉语里当时还没有别的词对译。

我们看到三个版本里,有一个例子值得注意,这句话恰恰是赵良嗣的话,其中也用“自家”作“咱们”讲。我们观察一下这些例子的异同。刘一之用的《三朝北盟会编》是“光绪四年岁次戊寅越东集印”的版本,刘坚、蒋绍愚(1992)用了三种版本校勘,包括光绪三十四年(1908)许涵度校刊本,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活字本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抄本。

(6)a. 未若自家两朝本无相争。(引自刘一之,1988:106)

b. 未若自家两家本无相争……(引自刘坚、蒋绍愚,1992:90)

c. [良嗣]“未若自来<sub>删此二字</sub>两家本无相争,便通交好,万世所无,乃是好事。”(卷一四:6B,光绪三十四年版本)

这个例子和例(4)是在同一场合说的。金朝元帅粘罕与马扩和赵良嗣讨价还价,希望得到和契丹一样数目的银绢,马扩解释说是当时宋朝和契丹厮杀多年后讲和给契丹的银绢,粘罕嘲讽道是否打一仗也能得到这些银绢(见例4)。紧接着赵良嗣力图说服金国保持宋金以前的关系(见例6)。这里的例子有三个版本,这对我们理解“自家”有益,“自家两朝”“自家两家”“两家”,这些不同的表达都是“包括式”的意义。例(2)里的“自家两国”也是同一个构造。有的例句用“两家”,也表达“自家”或“自家两家”的意义,除了例(6c)里的“两家”表达“包括式”,其他例子如:

(7)粘罕大喜云:“两家都如此,则甚好。”(卷四:6B)

(8)[兀室]“本待断绝,恐两家不好……”(卷一三:8B)

(9)[兀室]“便如西京地土两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卷一四:5B)

上面的例子表明,金人的语言多被译为“自家”,有时被译为“两家”。如果说,上述例子里金人口中的“自家”表达的是“包括式”,有的“两家”是一种省略的说法,那么有无其他语言证据表明“自家”是一种“包括式”呢?我们注意到,金人对话中,“自家”与“我家”是严格对立的,即“自家”表达“包括式”,而“我家”表达“排除式”。即“自家”和“我家”形成了最小对立。前人的研究未能注意到这点。最小对立是找出两个对比体中区别性特征的有效手段。尽管女真语被翻译成了汉语,但是这种对立只出自金人说的话,而不见于宋人的对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女真语里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否则这种规律的对立就不好理解,也无法解释为何宋人对话里没有这种对立。请看几个“排除式”的例子: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6B)里有这样的记载,他明显反对宋朝希望动兵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他见到宋使马扩时说:“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

② 如“其人语言不逊,令一燕人译语云”(《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一:8A)。

(10)阿骨打<sub>改作阿固达</sub>云：“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卷四:15B)

(11)粘罕<sub>改作尼堪</sub>云：“这事本不别，只是为我家自著兵马取得，所以须要赋税，肯时便肯，不肯即休”(卷一二:10B)

(12)粘罕<sub>改作尼堪</sub>云：“我家国中论事不尚退左右，要得人共知。”(卷二二:7A)

(13)[粘罕]“我家既得云中，闻你家始以兵来朔界，后赵良嗣、马扩等来，我皇帝责其败盟……”(卷五三:7A)

(14)[粘罕]“童贯再遣赵良嗣求祷我家，图燕京……”(卷五三:7A)

上述例子(10-14)中的“我家”都是金人对宋朝使者说的话，与前面引举的例子(1-6)截然不同。在《三朝北盟会编》中，金人说话的口气一直是咄咄逼人，特色鲜明。在例(10)至例(14)中，金人当着宋朝使者，责备宋朝(书里多记为“南朝”)的语气很直白，“我家”显然把宋人排除在外。而例(1)至例(6)也是当着宋朝使者，“自家”完全包括双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无论是“包括式”还是“排除式”，全部出自口头谈判材料，应该是当时的白话。这些例子记录表明谈判需要翻译。翻译尽量靠近元语言。所有出现的“自家”“我家”的例子都极为口语化。除了例5、例6出自燕人之口，其余全部出自金人之口。“自家”和“我家”的对立不见于宋人的口中。

“我家”做定语的例子很多，此处仅举几例：

(15)阿骨打<sub>改作阿固达</sub>令译者言云：“契丹无道，我已杀败，应系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卷四:4A)

(16)阿骨打<sub>改作阿固达</sub>云：“若不行军法后怎生使兵也。待一两日到居庸关你看我家兵将战斗有敢走么。”(卷一二:5A)

(17)[粘罕]“山前山后乃是我家旧地，更说做甚。”(卷二二:7B)

“我家”作为排除意义的出现次数很高，而“我们”作为排除意义的几乎看不到。刘一之发现的例子如下：

(18)a. 若是我们败，得物也，做主不得。我们过河去后，不只要这些物。(引自刘一之，1988:107)

b. [译者云，大金皇帝……]“若我们败时物也，做主不得，我们过河去后，不只要这些物。”(卷一六三:6B)

金人语言的排除式被译为“我们”的如此之少，而大部分都被译为“我家”，这可以证明排除式“我家”和包括式“自家”形成对立。宋代文献第一人称单数/复数都用“我”，《三朝北盟会编》也不例外。但是金人口语中的“自家”“我家”对立，这种对立不见于宋人对话中的记录；在燕人白话中见到两例“自家”用如“包括式”，而且都是在对话或谈判中，一例是燕人王介儒代表金人说话[例(5)]，一例是燕人赵良嗣代表宋人和金人对话[例(6)]。从这些语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推测，当时女真语里这种对立已经存在。

那么契丹语是什么情况呢？史书里有一些记载，可以使我们窥见契丹语的一些信息。比如在有关契丹语的记载里，《魏书》《契丹国志》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关条目，历史学家都把契丹人和室韦人一直放在一起。《辽史·国语解》里说：“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迹，土俗言语大概近俚。”很显然，从基因角度来看，室韦确实是蒙古人群的祖先人群之一，即奠基者父系之一(Wei等，2017)。前面已经说过，从语言学的证据来看，契丹语和蒙古语的许多词汇有同源关系；学者们大多都认为，契丹语是一种更接近蒙古语族语言的语言，而女

真语则是更接近满语的语言。“接近”也是基于语料里能够见到的实际语料做出的判断。契丹语虽然和蒙古语族的语言共享许多基本词汇,但是也有许多词汇和蒙古语族的语言大相径庭(Wu and Janhun, 2010; Vovin, 2011)。所以 Janhun (2003)称契丹语为“para-Mongolic”(我们暂且译为“准蒙古语”或“别类蒙古语”),说契丹语是一种蒙古语的近亲或别类是有一定道理和根据的,这个观点已为很多研究者接受。那么契丹人的语言里是否有这种对立呢?我们未见到契丹语里代词的用法,更不用说代词系统的全貌,故不清楚是否存在包括式/排除式的对立。金人一直沿用契丹文字,熟识契丹语,在金朝中期仍然使用契丹文字并通过契丹语学习汉语(夏宇旭, 2010)。这些史实告诉我们,契丹语对女真语的影响是深刻的。从后代的满语和蒙古语族诸语的代词系统看,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普遍存在。我们推测,当时契丹语里有可能存在这种对立。

## 六 包括式和排除式在北方非汉语言里的状况

兰司铁(1981[1957]:74)认为蒙古语、通古斯语的包括式来自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形式的组合形式,即 \* bi-ta。Janhun (2003:19)也认同这个假设,进一步说明包括式的形成是“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bi 加上第二人称复数形式 ta: bi+ta= \* bita > \* bida/ \* bide”。这个形式是一个复合词,过去的第一人称 ba 就成了排除式。根据 Janhun (2003:19)的研究,大约在 13 世纪左右,蒙古语里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出现了这一创新形式,即包括式。

在“引言”里我们已经说过,通过研究不同语系、不同语族语言里的包括式和排除式,语言学家都注意到,包括式是后起的、有标记的形式。哈斯巴特尔(2007)也认为蒙古语里的排除式是单一构成,更好地保留了原来的面貌,而包括式则是复合构成,是后来产生的。在今天的蒙古族语言里,只有达斡尔语里第一人称复数的主格保留了 ba 的形式,其他蒙古族语言第一人称复数的主格形式都让位给了 bide 的形式。这个源自复合形式的词现在已经固定为一个词了。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在《蒙古秘史》里,包括式和排除式俨然有别而不相混淆。Pope (1954:50)指出《蒙古秘史》里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非常清楚, bida 用于包括式, ba 用于排除式。蒙古语过去的第一人称主格用 ba, 但现在的第一人称主格都用 bida 了。刘一之(1988)关于两个词在《蒙古秘史》旁译里对应汉语不同词的数目也很说明问题,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译反映的这种对立很明显并且有规律。我们在上节谈到的金人口语里汉文对译也反映了女真语里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

我们看到历时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文献都反映出了 12 至 13 世纪的女真语和蒙古语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这个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契丹语有可能也有这种对立。这种对立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北方汉语里,这种出现就绝非偶然。那么共时材料里,这些非汉语是什么状况呢?为了节省篇幅,例子略去,请参见表 1 的概述。

蒙古语在 13 世纪产生了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Janhun, 2003),但是在现代蒙古语里,主格都统一为一个形式,其他格位的包括式、排除式的词根形式虽然保留了,但是已经形存实亡了。同属于蒙古语族的语言发展也是各行其道。在甘青一带的几种语言,除了土族语外,东乡、保安、东部裕固、康家都仍然保留了这个区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和国内

学者对东乡语和保安语的记录相反。斯钦朝克图(1999:176)指出:康家语“第一人称复数的排除式和包括式形式正好与古代蒙古语相反,同保安语和东乡语一致”。这一现象表明,东乡、保安、康家的表达形式发生了变化,没有遵循蒙古语的古老形式,这是出于什么动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表1里只记录了第一人称复数主格的情况。其他格位各语言都不相同,此处不计。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式可以产生,也可以消失,故不是一成不变的。请见下表,“+”表示有这种对立,“-”表示没有这种对立或这种对立在现代消失了。不同作者的不同研究结果都列在表中,研究结论相同的不重复。表1中的材料仅限于中国境内北部及西北非汉语言。

表1 北方非汉语第一人称复数主格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

语言	是否存在对立	说明	材料来源
蒙古语族语言			
共同蒙古语形成期 <sup>①</sup>	+	* ba 排除, * bida 包括	Janhunén, 2003:18-19
13世纪《蒙古秘史》	+	ba 排除, bida 包括	Volker Rybatzki, 2003:71
内蒙正蓝旗(现代)	-	主格不分	道布, 1983
蒙古国(现代)	-	主格不分	Svantesson, 2003:164
鄂尔多斯	-	主格等不分(只有属格有区分)	Georg, 2003a:202
达斡尔(莫力达瓦)	+	baa 排除, bed 包括	仲素纯, 1982:50
达斡尔(海拉尔)	+	baa 排除, daa 包括	Tsumagari, 2003:148
达斡尔(新疆)	+	manj 排除, bædøn 包括	赵明鸣、冬瑛, 1997:18-23
东乡(Santa)	+	bidziøn 排除, matan 包括 <sup>②</sup>	刘照雄, 1981:49
保安(甘肃)	+	bədə 排除, mangə 包括	布和、刘照雄, 1982:33
保安(青海)	+		陈乃雄, 1986:175
土族(民和)	-	不分;主格 da. si 来自过去包括式 * bida; * bida. s	Slater, 2003:314
土族(互助)	-	不分;主格 buda 来自过去包括式 * bida	Georg, 2003b:298 照那斯图, 1981a:25-26
东部裕固	+	buda 排除式, budas 包括式	照那斯图, 1981b:25 Nugteren, 2003:272
康家	+	bədə 排除, mənə 包括。有区别, 但不严谨了	斯钦朝克图, 1999:176

① Janhunén (2003:3) 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时期的语言称为共同蒙古语(Common Mongolic)形成的时期。

② Kim (2003:356)记录的东乡语和国内学者相反。他记录的是:matang 是排除, bidien 是包括。同样, Wu (2003:336)记录的保安语也与国内学者相左,他记为 man‘ge 是排除, bede 是包括。

续表

语言	是否存在对立	说明	材料来源
通古斯语族语言			
满语	+	bo 排除, mädzə 包括	王庆丰, 2005: 52 季永海等, 1986: 191
锡伯(新疆)	+	bo 排除, mäs 包括	李树兰、仲谦, 1986: 66
鄂温克(海拉尔) 鄂温克	+	buu 排除, miti 包括 bū 排除, mit 包括	胡增益、朝克, 1986: 48 Poppe, 1965: 192
赫哲	+	bu 排除, bəti 包括	安俊, 1986: 37
鄂伦春	+	buu 排除, mitii/mir 包括	胡增益, 1986: 88
突厥语族语言			
撒拉	+	cosim 排除, co 包括	马伟, 2013: 95
	-	无区分	林莲云, 1985: 53
西部裕固	-	无	陈宗振、雷选春, 1985: 81 Zhong, 2019: 238
藏缅语族语言			
安多藏语	+	ngəch'o 排除 əch'o 包括	Robin(即将出版): 108

Poppe (1965: 192) 曾经指出, 突厥语族里区分包括式和排除式的语言很少。突厥语言里只有乌兹别克 Khiva 方言里有这种对立。表 1 里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言, 西部裕固语没有这种区分,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其他突厥语同, 基本没有这个区分; 而撒拉语里的这种区分显而易见来自安多藏语的影响。马伟(2013) 的研究表明, 安多藏语和撒拉语都有一个共同的语素(ch'o/co, 请见表一), 记音的形式不同, 但实属同一个语素。由于突厥语没有这个区分, 那么借贷的方向一目了然。撒拉语受到当地安多藏语的长期影响, 引进了这一语法功能的表达。

蒙古语族语言达斡尔语历史悠久, 既和古蒙古语有很深的关系, 又和女真语、古通古斯语有很深的关系。以至于学者们把这个语言最初列入到通古斯语支, 后又列入到蒙古语语支(Todaeva, 1986: 1)。但是在蒙古语族语言里, 达斡尔语又独树一帜, 和其他现代蒙古语族语言有较大差异。钟素纯(2007: 1872) 认为: 达斡尔语“基本的语言成分来源于未分化以前的统一的古代蒙古语”。我们认为这一定位是很准确的。达斡尔语很好地保留了 13 世纪蒙古语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 不仅如此, 达斡尔语完整地保留了《蒙古秘史》里的最初形式。达斡尔语是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过渡带和连接带。再观察一下通古斯语, 所有的语言都很好地保留了这个区分。

从地理角度看, 甘肃青海一带的东乡、保安、康家属于蒙古语族的语言, 却和通古斯语里的排除式、包括式呈现一致的形式, 即起首辅音都用双唇塞音 b-(表达排除) 和双唇鼻音 m-(表达包括) 的交替形式。表 1 蒙古语族的语言显示, 包括式和排除式有趋于消失的倾向, 像其他蒙古语一样, 土族语里已经失去这种对立, 康家语里也开始有所模糊。可以说, 蒙古族语言里的这种对立在逐步退化。

通过考察对比历史材料和语言材料, 我们看到北方汉语和非汉语言形成了一个连续统

的演变链,但是非汉语里的演变很不一致,有的传承了,有的失去了(见图 1)<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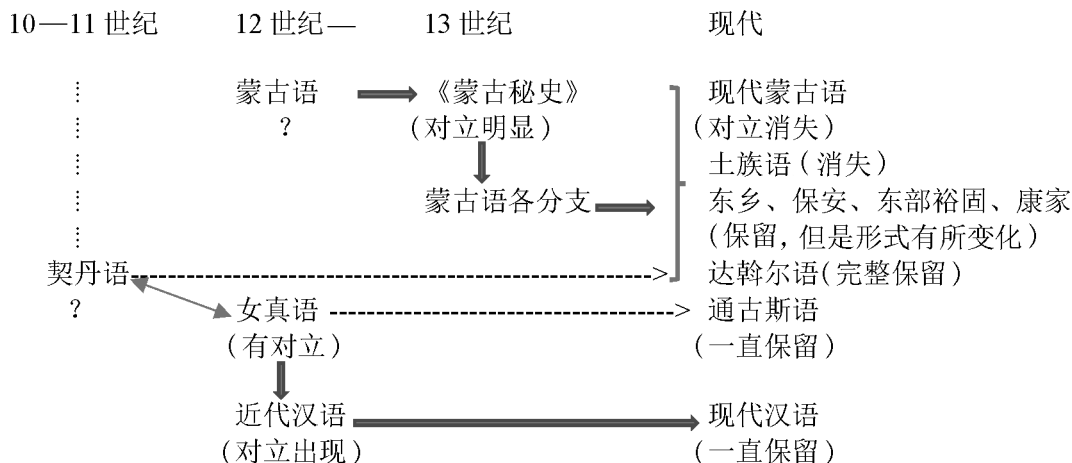


图 1 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产生和发展

图 1 中实线+箭头表示持续承传方向,虚线+箭头表示假设承传方向,双箭头表示相互影响。我们关注北方非汉语言包括式和排除式的产生和演变,是为了考察汉语里这种对立的来源。图 1 显示,12 世纪以前的语言材料暂缺。契丹语和女真语有过密切接触和互相影响,12 世纪的汉语文献出现了包括式(刘一之,1988),第一次的记录出现在金人和汉人谈判的对话中([宋]《三盟北朝会编》),汉语里包括式和“我们”产生了对立并一直保留了下来。《蒙古秘史》在 13 世纪记录了包括式,契丹语属于近似蒙古语类型的语言,Janhunen(2003: 396)认为契丹语里的某些创新很可能影响了周边的蒙古语。如果 Janhunen 这个推测是对的话,那么可以反推契丹语里很可能也有这种对立,但是目前还未找到语言上的证据。契丹语在北方及燕云一带是通行的语言。如果金朝语言里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这就很难排除准蒙古语——契丹语里有这种用法的可能性。

## 七 初步结论

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汉语里包括式和排除式的这个对立应该是受非汉民族语言的影响所致。从目前已有的材料看,金人的语言影响了北方汉语。汉语里早有“自家”的用法,由于语言接触促发了新的意义。今天遍布北方汉语的包括式,以及在蒙古语、通古斯语中广泛存在的例子都表明,这是历史某一阶段遗留下来的产物。很可能辽代汉语已经吸收了这个对立用法并传播扩散开来。我们注意到,传播这一用法的不是单一的群体,如有燕云汉人、汉化了契丹人及女真人、胡化了的汉人等。由于语言方面的材料匮乏,我们的结论也不一定准确。这篇短文只是抛砖引玉的一个尝试。

<sup>①</sup> 关于图 1 中蒙古语,Wu and Janhunen (2010:15) 认为 12 到 13 世纪是 Proto-Mongolic 时期。



## 参考文献

- [1] Bickel, Balthasar and Johanna, Nichols. Inclusive-exclusive person vs. number categories worldwide [M]// Filimonova Elena(ed.). *Clusivity: Typ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49-72.
- [2] Filimonova Elena. *Clusivity: Typ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3] Georg, Stefan. Ordos [M]// J. Janhunen(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a:193-209.
- [4] Georg, Stefan. Mongghul [M]// J. Janhunen(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b:286-306.
- [5] Janhunen, Juha. Para-Mongolic [M]// J. Janhunen(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391-402.
- [6] Janhunen, Juha. Liao: A Manchurian hydronym and its ethnohistorical context [J]. *Studia Etymologica Cracoviensia*. 2008; Vol. 13, 89-102.
- [7] Janhunen, Juha.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behind the scripts [J]. *Scripta*. 2012;4, 107-132.
- [8] LaPola, Randy J.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M]// Filimonova Elena(ed.). *Clusivity: Typ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291-311.
- [9] Nugteren, Hans. Shira Yughur [M]// J. Janhunen(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265-285.
- [10] Poppe, Nicholas.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4.
- [11] Poppe, Nicolas.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5.
- [12] Robin, Françoise. (to appear) *Parlons Amdo* [M]. Paris: Harmattan.
- [13] Rybatzki, Volker. Middle Mongol [M]// J.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391-402.
- [14] Shen, Zhongwei. Early Mandarin seen from ancient Altaic scripts-The rise of a new phonological standard [M]// W. Y. S. Wang and CF Su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91-103.
- [15] Slater, Keith W. Mangguher [M]// J. Janhunen(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307-324.
- [16] Svantesson, Jan-Olof. Khalkah [M]// J.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154-176.
- [17] Todaeva, B. H. *Дажырский Язык* [Daur language] [M]. Moscow: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6.
- [18] Tsumagari, Toshiro. Dagur [M]// J.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9-153.
- [19] Vovin, Alexander. A modest proposal on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Khitan-Jurchen bilingual text of 1134 (the Langjun inscription) [M].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11:123-130.
- [20] Wei Lan-Hai, Huang Yun-Zhi, et al. Phylogeny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3b-F1756, an important paternal lineage in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 [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7:62:

- 915-918.
- [21] Wu, Hugiiltu. Bonan[M]// J. Janhunnen(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325-345.
- [22] Wu, Yingzhe and Juha Janhunnen. *New Materials on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A Critical Edition of Xiao Dilu and Yelii Xiangwen*[M]. Kent:Global Oriental. 2010.
- [23] Zhong, Yarjis Xueqing. *Rescuing a language from extinction: Documentation and practical step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Western)Yugur*[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9.
- [24] 爱新觉罗·瀛生. 满语杂识[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25] 安俊. 赫哲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26] 布和,刘照雄. 保安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 [27] 常征江. 对四库馆臣删削《三朝北盟会编》的考察[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105-121.
- [28] 陈乃雄. 保安语和蒙古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 [29] 陈宗振,雷选春. 西部裕固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 [30] 崔译文. 三朝北盟会编言说概念场词汇系统研究[D]. 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13.
- [31] 道布. 蒙古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 [32] 邓广铭,刘浦江. 三朝北盟会编研究[J]. 文献,1998(1):93-117.
- [33] 恩和巴图. 达斡尔语和蒙古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 [34] 范朝康. 三朝北盟会编口语词选释[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66-69
- [35] 傅林. 辽代汉语与河北方言语音层次的形成[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31-41.
- [36] 哈斯巴特尔. 蒙古语、突厥语和满一通古斯语第一人称代词比较[J]. 满语研究,2007(1):20-29.
- [37] 哈斯巴特尔. 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J]. 满语研究,2008(2):23-29.
- [38] 呼格吉乐图. 契丹语与蒙古语共同词汇研究[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7.
- [39] 胡敏韬. 三朝北盟会编中的三身代词句法语义特征[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4):109-117.
- [40] 胡增益,朝克. 鄂温克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41] 胡增益. 鄂伦春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42] 黄宽重. 永乐大典中三朝北盟会编史料及其相关问题[J]. 文献,2003(2):98-112.
- [43] 纪楠楠. 论辽代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 [44] 季永海等. 满语语法[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45] 金光平,金启琮.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46] 金启琮,乌拉熙春. 女真语与满语关系浅议[J]民族语文,1994(1):11-16.
- [47] 吉日嘎拉. 试析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共同语言[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10-11.
- [48] 兰司铁.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M]. 陈伟,沈成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1981.
- [49] 李树兰,仲谦. 锡伯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50] 林莲云. 撒拉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 [51] 刘坚,蒋绍愚.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52] 刘坚.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J]. 语文研究,1982(1):97-104.
- [53] 刘浦江.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J]. 民族研究,1998(6):57-65.
- [54] 刘一之. 关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产生年代[M]//语言学论丛(第十五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92-110.

- [55]刘照雄. 东乡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 [56]吕叔湘. 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M]//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卷二期),[1940]1984:1-37.
- [57]吕叔湘. 说“们”[J]. 国文月刊, 1949:79,1-9;80,4-11.
- [58]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近代汉语指代词[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5.
- [59]马伟. 撒拉语形态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 [60]梅祖麟. 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J]. 书目季刊, 1980(2):27-52.
- [61]梅祖麟. 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来源[M]//语言学论丛(第十五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41-145.
- [62]桥本万太郎. 语言地理类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1985.
- [63]斯钦朝克图. 康家语[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 [64]孙伯君,聂鸿音. 契丹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65]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8]1987.
- [66]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7]王聪. 汉语人称代词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巴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2016.
- [68]王力. 汉语史稿(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58]1980.
- [69]王庆丰. 满语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70]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卷四)[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71]夏宇旭. 金代契丹人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0.
- [72]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3]雅洪托夫. 十一世纪的北京音[M]//唐作藩,胡双宝,编选. 汉语史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1986:187-196.
- [74]叶隆礼. 契丹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5]张清常. 汉语“咱们”的起源[M]//语言研究论丛(第二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91-95.
- [76]赵明鸣,冬瑛塔城. 地区达斡尔语语法的一些特点[J]. 语言与翻译, 1997:4,18-23.
- [77]照那斯图. 土族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1a.
- [78]照那斯图. 东部裕固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b.
- [79]钟素纯. 达斡尔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 [80]钟素纯. 达斡尔语[M]//孙宏开. 中国的语言.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872-1891.
- [81]仲伟民. 三朝北盟会编传本及其体例[J]. 史学史研究, 1990(2):36-42.

## The Source of the Inclusive Use in Northern Chinese: An Investigation Util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Xu Dan

**Abstract:**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in the first plural person pronoun attest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12th century appears to come from non-Chinese or non-Han languages in the North. Bot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carce linguistic examples suggest that the source is likely the Jurchen language. People who had spread this usage might be Han, Altaicized Han, or Sinicized Khitans and Jurchens from the Yanyun area. The *Sanmeng Beichao Huibian* from the 12th century shows that *zija* (we-inclusive) and *wojia* (we-exclusive) were used distinctively in the Jurchen language, forming a minimal pair,

and the first examples of this usage are found in dialogues of Jurchens. 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in the Yanyun area was the first one which had adopted this inclusive use.

**Key words:** Inclusive, Northern Chinese, Jurchen language, Khitan language

通信地址: Hegestraße 59, Raum 06—308

邮 编: 55122 Mainz, Germany

E-mail: dan. xu-song@ehess. fr